

義山墓冊中的海外華人社會史

——英屬馬來亞雪蘭莪巴生福建義山研究

(1920-1950年代)

江柏煒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摘要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Klang)坐落於馬來半島西側中部，東距吉隆坡約35公里，是雪州的皇城，亦為巴生河谷的港口城市。19世紀起，隨着錫礦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樹膠產業的蓬勃發展，巴生地位變得重要。1901年9月巴生港開港，吸引了大量福建、廣東和印度淡米爾為主的移民，他們從事勞動工作、駁船航運或商業活動。1904年，巴生福建公所成立，以聯絡同鄉及為成員謀福利。1901年，洪宜樹捐獻中路口樹膠園一段，闢為義山，初由永春公司（公所）管理，後來成為福建公塚。福建會館保存了自1921年起，福建義山的墓冊資料，以華文與英文記錄卒者的姓名、祖籍地、年紀、死亡原因、住所、婚姻狀況、家庭成員等訊息，是瞭解巴生福建社群的珍貴社會史材料。

義山（公塚、義塚、義莊）是海外華人社會處理移民喪葬的公共事務、移民社會共同體建構的過程、社群政治的自治機制、也是

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郵政編碼：10644，電郵：quemoei@gmail.com.

本文的資料收集，感謝巴生福建會館的支持。同時，也感謝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博士班研究生陳立圓、胡冰清、黃鬱鈞、洪士惠、陳思予等人參與掃描、整理、統計等工作。感謝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林德順教授對於巴生舊地名的指導。感謝雪蘭莪金門會館呂清便前主席、陳良吉主席、劉志山秘書長、許晉福總務等人之協助。同時，在此也感謝期刊匿名審查者所提供的寶貴建議。惟文中謬誤，由筆者負責。

具有在地特徵的文化景觀。本研究以英屬馬來亞時期的雪蘭莪州巴生福建社群為例，探討義山作為一種具有社群政治與文化景觀意義的公共領域建構的動態過程。首先探討巴生福建會館在當地如何成為華人移民社會的整合機制，以及瞭解其於不同歷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進而以福建義山田野調查資料及墓冊材料，深入分析討論巴生福建社群的社會結構變遷與社群政治。最後，本文探究東南亞華人會館與義山作為一個機構（機制）而呈現的兩個課題：整合生者的社群政治及處理亡者的文化景觀，並探討其歷史功能與象徵意義。

關鍵詞：華人會館、義山、社群政治、文化景觀、英屬馬來亞

一、研究緣起及研究方法

移民研究，特別是移民社群離散與反離散(diaspora and against diaspora)的情境，以及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碰撞、衝突或交融，是近20年來人文社會領域非常關注的學術課題。^① 跨境/跨國華人(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hinese, 華僑華人)研究是其中的一個焦點，討論華人在原鄉以外的世界重建社群網絡之各種機制，更是重要的學術課題。換言之，通過不同的發問，嘗試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華人移民散居的情境，他們在不同地方的社會組織過程及文化調適、融合或衝突，以及他們如何維繫家族、地緣的網絡關係，對於中國及當地國之國族認同的意識之形成、轉變；當然也包括海外華人社群對於華人文化歸屬、中國性(Chineseness)或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文化想像、書寫再現及具體實踐等。

華人移民的語言文化背景、移民過程的特性影響了早期星馬華人社會的組織方式及內部結構。林孝勝指出，「幫」是一個方言社群，它帶着濃厚的地緣性和業緣性，偶而附有血緣性。^② 各幫成立組織一開始之目的，饒宗頤認為是以「旅客塋墓之處理，最為迫切。故華人社團，實發軔於公塚，由公塚而組織會館。」^③ 早期貧困僑民客死異鄉，經常無法遷葬返鄉，故協助處理身後事成為海外華人社會重要的公共事務，包括購置義山，成立組織管理。也因為涉及送葬事宜，宗教信仰的海外傳播獲得在地化。成立於1646年、閩南人所建立的馬六甲青雲亭(Cheng Hoon Teng Main Temple)，是馬來半島華人社區最古老的義山與宗教信仰中心之一。

麥留芳曾以「方言群認同」概念討論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以別於清代臺灣漢人移民史中以「祖籍地認同」的組織法則。他指出清代來臺漢人絕大多數從事農耕，爭奪土地及灌溉水源似乎是分類械鬥的主要原因；但在早期星馬，華人移民的行業卻是多元化的：商業貿易、種植各種產物（樹膠、甘密等）、開採礦藏等，且由於不能自由領有土地，加上農耕自古以來已是馬來人的傳統維生行業，從事農業者少。從事勞務密集型行業，會促使

① 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 Macmillan, 1993); Douglas S. Massey etc.,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②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頁29。

③ 饒宗頤，〈星馬華人碑刻繫年〉，《新加坡大學中文學刊》，第10期（1969），頁6。

一個祖籍群擴大地域界限，但也並非無止境的擴大，是故方言群認同符合早期星馬華人社會的經驗。同時，他從方言群的互動模式，如個別幫群的開放或封閉、跨幫參與的情況等，分析海外華人團體的結構模式時提出橫縱兩種模式。縱軸的結構是一些具有不同程度排他性的組織，如會館、義塚等；橫軸的結構是具有融合性的組織，如會黨、宗祠或姓氏團體、公共祭祀團體。^④

義山（公冢、義塚、義莊），作為海外華人社會處理移民喪葬的公共事務，其實是移民社會共同體建構的過程，也是一種社群政治的自治機制，更是一種具有在地特徵的文化景觀。但過去的研究較少重視，多數視其為會館的一種附屬機構來看待，也少有義山相關文獻之分析，值得進一步重視。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Klang, Selangor）坐落於馬來半島西側中部，東距吉隆坡約35公里，是雪州的皇城，亦為巴生谷（Klang Valley）的港口城市。19世紀起，隨着錫礦業的迅速擴張，巴生地位變得重要。開拓者從巴生港口沿着河谷開採錫礦，並逐漸擴展到吉隆坡周邊區域；加上樹膠產業的蓬勃發展、1901年9月巴生港開港，吸引了大量華南、印度淡米爾為主的移民進入巴生，從事勞動工作、駁船航運或商業活動。

巴生的開發比吉隆坡早，前者以福建（閩南）移民為主，後者則為廣府人。1904年巴生福建公所成立，用以聯絡鄉誼及謀求福利。這是今日巴生福建會館的前身。筆者在2017年前往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Klang）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巴生福建會館收藏有大量福建義山墓冊原始資料，但過去未有任何整理、數位掃描建檔或分析。在福建會館的信任及同意下，進行了超過5年的整理與歸納。這些資料大致上能分為三類：總冊（最早於1921年起，見附圖1）、公塚登記簿（1941年起，見附圖2）、收據簿（1950年起，見附圖3）。尤其是總冊，以華文與英文登載亡者的資料，包括「報告日、名字、祖籍地縣、性別、年紀（壽命）、從事行業、已婚未婚、死期、死因、死處、子女名字、夫妻名字、通報人名、塚地號、交銀幾元、特別記事」等。（見附圖4）作為第一手的資料，這批墓冊簿所載的內容，從1921年迄今，以巴生福建人為中心，具體呈現了各種社會史的信息，如地緣移民分布、性別比例、平均年齡、婚姻比例、行業情況、公共衛生或死亡原因分析、居住區域分布、經濟狀況等，非常具有研究價值。

^④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138-139、183。

面對如此龐大的資料，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對1920年代至1955年代的總冊資料進行抽樣整理、統計，每5年為一區段，各區段取前200筆資料，共1,600筆資料。這批抽樣資料的年代見附表1。藉由這些資料的統計與分析，本文嘗試瞭解1920-1950年代之間巴生福建社群的社會史訊息。

因此，本文擬以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福建社群為主，探討義山作為一種具有社群政治與文化景觀意義的公共領域建構的動態過程。首先，探討巴生福建會館在當地如何成為華人移民社會的整合機制，以及瞭解其於不同歷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在福建義山田野調查及墓冊分析的基礎上，深入討論巴生福建社群的社會結構變遷與社群政治運作。最後，本文將探究東南亞華人會館與義山作為一種機構（機制），其所呈現的兩種課題：整合生者的社群政治及處理亡者的文化景觀，並分析其歷史功能與象徵意義。

二、雪蘭莪巴生的發展與多族群社會的形成

歷史上，馬來亞位於東南亞的核心，處於西方及東方兩大貿易國——印度和中國之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多元族群與文化交融之處。華人移民社會和語言背景及移民過程的特性決定了早期華人社會的組織和結構。信仰是最早凝聚海外華人的方式之一，成立於1646年的馬六甲青雲亭(Cheng Hoon Teng Main Temple)，為閩南人所建立，是馬來半島華人社區最古老的宗教信仰中心。之後，中國強韌的血緣紐帶促使早期華人移民熱衷設立宗親組織^⑤，不同的語言和區域特徵導致他們各自成立代表其方言的會館。^⑥

其中，雪蘭莪巴生(Klang)坐落於馬來半島西側中部，東距吉隆坡約32公里，是雪州的皇城，亦為巴生谷(Klang Valley)的港口城市。巴生的華文名稱，據說是當年華人常聽到馬來話 pasang（漲潮之意），而把它冠上的。這個詞展現了巴生河流漲潮時辰對於商人的重要性。關於馬來語 Klang 一詞的來源，則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據說從前巴生河畔有人造船，常有「callang callang」的打鐵聲音傳來，這種音響有「clang, clan, callangh, kalang, galang, galong, kolong, clam」等不同拼音，最後才輾轉拼成

⑤ Yen Chin-hwang, "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1 (1981): 62-87.

⑥ Yen Chin-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36.

「Klang」這個名稱；而第二種說法是來自於 Kilang 一詞。Kilang 在馬來語是工廠、廠房的意思。由於當年這裡有許多倉庫，所以就稱這裡為 Kilang，最後演變成今天的 Klang。^⑦ 另一個說法則是以英國人常聽到巴生河畔有潮汐撞擊河岸，產生 callang 的聲音，因此英國人將之命名為 Klang。巴生也曾被稱為 Pengkalan Batu，石碼頭之意。^⑧ 不過，這也清楚說明巴生的馬來名字吉冷（Klang）與華人所稱的巴生（pasang）說法大有不同。

15世紀的巴生是蘇丹在馬六甲的屬地。在1511年馬六甲由葡萄牙控制之後，巴生仍為馬來人的地方，並由柔佛廖內的蘇丹控制，直到18世紀創建雪蘭莪蘇丹王國。19世紀起，隨着錫礦業的迅速擴張，巴生地位更為重要。開拓者從巴生港口沿着河谷，開採錫礦，並逐漸擴展到吉隆坡周圍的區域。此時，雪蘭莪皇室也發生了皇位之爭及錫礦之爭，拉賈·馬哈迪（Raja Mahdi）與拉賈·阿卜杜拉（Raja Abdullah）互不相讓，導致當時雪蘭莪發展受挫。這也讓英國人趁機介入，於1874年逼迫雪蘭莪蘇丹簽署條約，成為英國的保護國，至此雪蘭莪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經過英國人的協調後，經濟活動恢復。在1896年，英國人將雪蘭莪、彭亨（Pahang）、霹靂（Perak）和森美蘭（Negeri Sembilan）四個邦組成馬來聯邦。^⑨

巴生在英殖民首府1880年遷至吉隆坡後，成為雪蘭莪州的行政中心。不過巴生市區的商人、礦工，一批批地湧進吉隆坡，在1879年吉隆坡的人口增長率達30%。吉隆坡的崛起，影響了巴生的發展。1870年代的吉隆坡，是雪州的主要貿易中心，也是錫業的繁盛地帶。1890年5月，英殖民政府建立了巴生潔淨局（Klang Sanitary Board），負責管理巴生鎮。目前巴生的行政範圍也是於1895年劃定的。1926年，巴生潔淨局和巴生舊港（Port Swettenham, 又譯瑞天咸港）合併，並於1945年更名為巴生市政局（Klang Town Board）。^⑩

⑦ 〈《巴生，一個有故事的城市》之一〉（原載於《星洲日報》，2016年10月5日），2019年12月13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26023544/http://lefthand.blogkaki.net/viewblog-34454/>。

⑧ 洪天賜，〈巴生的歷史輪廓〉，《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巴生：巴生福建會館出版，1982），頁687-692。

⑨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Honolulu: Hawaii Press, 2001), 160-161.

⑩ 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Selangor,”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 3 (1934): 1-34. 巴生濱海南安會館，《巴生濱海南安會館金禧紀念特刊》（巴生：編者自印，2005），頁130-134。

雪蘭莪州的土地蘊藏了豐富的錫礦，氣候條件也非常適合樹膠的生長，於是吸引了大量的中國和印度移民。巴生成了華人進入雪蘭莪州礦場工作、經商的據點。據統計，1879年底巴生人口只有兩千人，至1884年底已超過3,500人。^⑪ 20世紀初人口激增，從1911年的7千人增到1970年的10萬人。截至2010年的統計，巴生區的總人口842,146人，其中巴生市人口佔240,016人（市中心則有10,445人）。^⑫ 進一步分析，在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之際，巴生的華人比例高達43.65%，是所有族裔最高的。一直到1970年代，情況仍然如此，華人佔43.02%，亦為比例上的優勢族群。但隨後持續下降，到了2010年為26.83%。馬來族的人口比例則持續上升，到了2010年馬來族約佔41.18%，印度裔也約佔21.37%。（見附表2）^⑬ 華人已非巴生主要的族群。

19世紀後期，華人絡繹不絕到南洋謀生。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巴生地處濱海，加上巴生河的地利之便，資源豐富，成為華人落腳處之一。一百多年來，巴生華人建立了會館、義山、學校、廟宇等公共空間，作為華人社會運作的機制。（見附圖5、6、7）以福建社群之一的金門移民為例，早期鄉僑到此多數從事勞動工作，如伐木、操艸舡、劈柴等，巴生河沿岸的火鋸、板廊等木材加工產業也以金門人為主，其中柴埕^⑭ 即為一例。近海的浮羅吉膽（螃蟹島，Palau Ketam）也因為漁業資源豐富，吸引了海南人、潮州人、同安人、金門人等的移居。是故，巴生市鎮、巴生港及吉膽島也出現金門人的鄉團、會館。目前文獻資料記載最早的鄉團為1909年以前創建的巴生金浯江公會（伍德宮，主祀邱府王爺）、1920年的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1921年的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伍德宮，主祀蘇府王爺）以及1946年的雪蘭莪金門會館及1947年的巴生浯聲協進社。大致上可以說，戰前的鄉團性質上是地緣、業緣、神緣所凝聚的佔俚間（苦力間），同時也是供奉原鄉分香而來的神祇的廟宇，因此，這些鄉團兼具照顧新僑、排解糾紛的世俗功能及慰藉心靈、

^⑪ 巴生濱海南安會館，《巴生濱海南安會館金禧紀念特刊》，頁130-134。

^⑫ MPK, Klang, "TABURAN PENDUDUK DAN CIRI-CIRI ASAS DEMOGRAFI TAHUN 2010," MP Klang Site,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4 March 2014.

^⑬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able 13.1: Total population by ethnic group, Local Authority area and state, Malaysia, 2010," p. 181,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7 February 2012.

^⑭ 柴埕為位於巴生市區、濱臨巴生河畔的一個地名及產業聚落，多數為金門移民聚居。這裡因河運之便，上游砍伐下來的木材到中下游的巴生市區，自20世紀初起即有數百位的金門移民在此建立了火炭、製香、鋸木廠、木材加工等行業，並將原鄉神祇供奉在這個聚落，建立了十數間的廟宇。這個名為柴埕的地方在2010年之後因政府徵用土地，逐漸拆除而消失。

祈求平安的信仰功能。戰後所成立的會館，則為一種以鄉誼聯絡、發展商業、慈善公益、娛樂生活為目的的社會網絡建構。^⑯

巴生港，原名瑞天咸港(Port Swettenham)，是馬來西亞的主要港口，位於檳城和新加坡主要港口之間的馬六甲海峽中間。它是聯邦首都吉隆坡的港口，東北偏東 23 英里（37 公里），公路和鐵路與之相連。該港口由馬來亞鐵路公司開發。在1901年開放後的兩個月內，港口因瘧疾而關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取得重大發展，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分別建造了新的深水泊位，以及適合裝卸集裝箱和常規貨物的碼頭。^⑰ 晚近的發展趨勢則是，隨着吉隆坡都市化的蔓延，巴生逐漸成為吉隆坡的近郊城鎮。巴生河的巴生谷沿岸，安邦(Ampang)、吉隆坡、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莎亞南(Shah Alam，現在雪蘭莪首府)、巴生、巴生港口等，連成一個大型都會城市。巴生是目前雪蘭莪州人口最多的市鎮。（見附表3）

三、移民社會的統合機制：巴生福建會館、福建義山的運作

(一) 從福建公所到福建會館

歷史上，巴生華人社會主要以福建移民為主。20世紀初，鑑於福建移民漸多，祖籍地為中國福建南安縣十二都大演鄉人的洪宜樹為照顧福建社群，於1901年慷慨獻贈土地兩段，即巴生中路口高級中學旁大草場後方八英畝及慈義廟左旁六英畝以安葬客死異鄉的鄉人。^⑱ 接着，1904年葉金雞、李鴻伯籌劃組織同鄉會，以聯絡鄉誼及謀同鄉福利，遂於同年宣告成立「福建公所」。^⑲ 福建公所成立後，洪宜樹即將捐獻出來的土地作為義山使用。福建公所得到鄉僑們的支持，復得柯水實捐獻地皮一段，作為館宇之用，於是一面發動籌款，一面興建會所，在極短暫之一年時間內，館舍建築落成。1912年，巴生首間中華學校借福建公所會所成立並開課，為時凡七年。^⑳ 福建公

^⑯ 江柏煒，《海外金門會館調查實錄：馬來西亞篇》（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頁76-98。

^⑰ “Port Kelang”，2023年4月17日，<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Port-Kelang>。

^⑱ 〈頌德碑〉（2020年），立於巴生福建中路口義山，巴生福建會館。

^⑲ 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巴生：巴生福建會館出版，1982），頁81。

^⑳ 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1。

所及其義山的成立，說明福建移民在海外異地的具體情境下，建立了一種處理公共事務的社會整合機制。

1918年，福建公所陷入停頓。原因是華人與英人發生糾紛，引起巴生華人公憤，大鬧法庭，致發生毆鬥事件，福建公所被指控為幕後策動者，因而遭受到當時殖民地政府下令關閉的打擊，會務遂告停頓，歷時幾近三年。1921年鄉賢孫流水、沈水德向當局幾經交涉，會所終獲重新註冊，乃改名為「閩南公所」，並於是年8月15日正式復辦。復辦以後，當時董事諸公鑑於公所基礎未臻穩固，於1927年發動募集建業基金，由「吳福發、葉德建、葉法聿、陳嘉庚、李紹疊、林文敏、姚金榜等七位先生首獻巨金以為號召，復得閩籍紳商響應，籌得巨資購置巴生爪亞社路七英里處之樹膠（柅）園27英畝。」²⁰ 經歷關閉而重新註冊的閩南公所得到巴生福建商人的支持，得到新的發展契機。

1941年年底日軍入侵馬來亞，直到1945年戰敗後，馬來亞又恢復英殖民體制。期間華人社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包括貿易網絡、會館業務等，甚至是戰前東南亞各地一些重要的華人領袖，因抗日之故而遭受報復或殺害，華人社團自然面臨改組。1947年5月9日，巴生福建公所重組，改為「福建會館」。首任正副會長為林篤水、楊璇石。²¹ 1967年之後，福建會館致力籌募款項以興建新的會所大廈，也通過了新的會館章程。²² 其中管理義山，是會館重要宗旨之一。

換言之，巴生福建會館歷經福建公所時期（1904-1918）、停頓時期（1918-1921）、閩南公所時期（1921-1947）、福建會館階段（1947年迄今）²³，與大歷史的變遷息息相關，也因應巴生福建社群的社會需求而有所調整。從二次大戰之後的重組及運作可見，福建會館的領導階層重視義山管理的制度化、獎貸學金的建立、會所產業的擴增等方向，使得福建會館成為

²⁰ 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1。

²¹ 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1。

²² 《巴生福建會館章程》的第三條，強調了其設置的宗旨：「本會宗旨如下：甲、促進同鄉感情。乙、舉辦慈善事業及振興教育文化。丙、發揮互助精神。丁、管理巴生福建義山。戊、本會館得參加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為會員。」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162。

²³ 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2-83。

巴生最具活力及影響的華人社團之一。^㉙ 此外，1977年福建會館新大廈落成，可謂會務進展之重要里程碑，開幕剪綵邀請馬來西亞福建聯合會會長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主持，凝聚了華人社會的向心力。（見附圖8、9）

（二）福建義山的運作

一般來說，東南亞華人方言地緣組織的成立一開始多半得面臨移民在海外安葬的問題。1901年洪宜樹獻地闢為義山，初為永春公司（公所）^㉚管理。1904年福建公所成立，1921年重新註冊為閩南公所，義山仍為重要公共事務。巴生的福建移民，以永春籍民為多，故義山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管理由巴生閩南公所和永春公所輪值管理。但由於事權未能統一，經徵得永春公所的同意，乃於1948年歸由福建會館統籌之。^㉛

1950年代，墓地不足，福建會館決定於1959年購置中路六支樹膠（棍）園約70英畝，備作墳場之用，復於1961年購置爪亞社路四支咖啡園約20英畝（現種植棕油樹），以充裕會館經費。同時，福建會館原有中路口及五條路

^㉙ 1960年代後期，巴生福建會館積極籌募、建立規模完整的永久會所，充實會館財政收入，並以助（貸）學金照顧福建幫群為主的華人子弟，當然也包括當時容量已不足的義山墓園之增購。這些工作如下：1. 出售彭亨井地產換購聯邦大道旁3英畝地段，作為建新大會堂之用。2. 翻種爪哇路棕油園，以補充會館財政來源。3. 修改貸獎學金章程，使趨於完善，並繼續頒發大、中學貸學金。4. 增購塚地，並充實塚地設備改善設施及訂立公塚細則。5. 積極展開興建新大會堂募捐及籌建等工作。見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2-83。

^㉚ 原名永春公司，以亞答屋聯絡鄉情，兼祀張公聖君，首任會長李文檳。1912年翻建會所，並易名「雪蘭莪永春公所」。1928年，改總理制為委員制，受華民政務司看重，被委任處理同鄉之間的糾紛。1933年經濟不景，為拯救共和學校，該會曾將會所免費借給學校作為校舍。1941年，日軍南侵，會務停頓；1946年，社團註冊局通令改訂章程，重新註冊，乃重新恢復。1969年春，主席陳德水及諸執委鑑於會所年久失修，傾頽堪虞，提議將後半段翻建四層樓宇。因屬鞏固基業美舉，且可充裕經濟收入，作為同鄉福利金，遂成立重建委員會負責進行。終在通力合作下，獲新馬各州同鄉熱烈嚮應，慨捐巨款，如願以償，完成後段四層大禮堂三間、前座中段大廳一間的改建工程，並於1972年八十週年會慶舉行落成開幕儀式。1973年秋，再度大興土木，開始第二階段工程，1976年完成公所大廈。1976年，黃錦標擴大會務，創立青年團、教育組、福利組等，1986年成立外丹功班。1989年主席顏玉珍設立婦女組籌委會。1992年該會易名「雪蘭莪永春會館」，把主席改稱會長，增加署理會長、副財政及婦女組，並設舞蹈班。該會除了照顧會員福利，凡施貧贈老、社會慈善、教育事業等莫不盡力而為。（整理自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114；〈馬來西亞巴生福建會館〉，2022年4月19日，<http://www.nanchens.com/txh/txh04/txh04003.htm>。）

^㉛ 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2。

義山二處，因年代久遠，穴位告盡，乃於1960年由福建會館財政黃金陵先生慨獻1,000元購置吉隆坡路雙溪冷金園地二段作為義山，又於1965年開闢中路六支新義山並制定公塚細則，俾便管理。1970年代也持續購置塚地，並充實塚地設備、改善設施及訂定公塚細則。²⁷因此，直到今日巴生福建會館所轄有四座義山，分別為中路口義山（佔地14英畝）、五條路義山（佔地30英畝）、中路六支義山（佔地68英畝）、雙溪冷金（冷甘）義山（佔地14英畝）。其中佔地規模最大為中路六支義山，四座義山總面積達130英畝²⁸。亦即，隨着移民的落地生根，福建義山的需求愈來愈大，會館必須購置新的墓地加以因應，同時也需要籌募相關資金或添置產業來維持財政的平衡，並且制訂公塚管理規則來妥善營運。

義山管理既然是福建會館重要的公共事務之一，因此在會館組織中設置有塚務股，並有「正副塚務二人」，也制定相關的管理規章經辦之。以〈巴生福建會館中路六支第二公塚細則〉為例，條文中明定葬喪事宜必須遵守的事項，也規範了義山穴位的大小、價格。在第12條「凡屬貧窮者，得向本會館請求免費安葬四號位（E）之坟地，經會長或總務或塚務股長查明屬實後，准予豁免收費。」還有，第13條「凡非閩籍之華人，如無自置義山可資安葬者，經本會會長或總務或塚務股長認可時，依本細則規定准予安葬。」²⁹也就是說，福建義山規劃了濟貧的機制，幫助無力下葬的華人；另

²⁷ 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82-83。

²⁸ 〈巴生福建會館義山〉，2022年4月17日，<https://hokkienklang.com/index.php/equipment/cemetery>；〈巴生福建會館會長拿督鄭今智一行人於日前到訪吉隆坡福建義山「聚福閣」骨灰樓〉，2022年4月17日，<https://www.fujian-ren.com/?p=8734>。

²⁹ 〈巴生福建會館中路六支第二公塚細則〉摘要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等規定：

第一條：本公司塚由本會館購買，專供同鄉逝世者營葬之用。

第四條：超等位其四週須留餘地二英尺，特別位及四號位，其四週須留餘地一英尺，以為行人道。（如購買超等位毗連二穴或以上者，其中間界線准予免留行人道）。

第五條：營葬新墳及建造風水時，不得移動鄰墳，其圍牆高度不得超過二英尺，並須將穴位號牌安置在墓背上離地面六英寸。至四週所留之餘地，必須加築石灰，其厚度不得少過四英寸，以為行人道。

第九條：凡啓棺執骨者，須將舊棺焚毀，並須填補原穴，如遷葬之處仍在本山之內者，須照慣例繳納地價，但起葬之舉，須經政府批准，方可施行，惟其原穴則歸本會所有。

第十條：本塚山墓地面積及地價訂定如下：

外在特殊的情況下，福建義山也開放社群邊界，如非福建移民且無處安葬者，得經允許可長眠於此。這些舉措都說明福建義山具有慈善性質的社會功能。

其中規模最大的福建義山中路六支公塚（又名巴生中路6英里福建義山）位於巴生市鎮的北方，約15公里的山丘上。整個配置依山而建，順着坡地規劃穴位，山脚下建有大伯公廟（土地公廟），符合華人對於風水的要求。環狀路線聯繫各區的墓地，連接到最高處的圓環，圓環上並建有一座涼亭，紀念意義十足。山棱線上的墓園則以同心圓配置方式，一圈一圈向外。這種圓環式的放射線狀土地配置，明顯地受到英國殖民地城市規劃的影響。（見附圖10、11）

四、墓冊簿中的巴生福建社群訊息

巴生福建會館所藏的墓冊是目前罕見的海外華人史料。自1921年起，這些墓冊資料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每一筆資料以華文與英文記錄着卒者的姓名、祖籍地、年紀、死亡原因、住所、婚姻狀況、家庭成員等訊息，是瞭解巴生福建社群珍貴的社會史料。

超等位（AA）墳地長卅四英尺，闊廿五英尺，定價一千二百元，但營葬不得超過三穴。

特別位（A）墳地長卅英尺，闊廿英尺，定價六百元，但營葬不得超過三穴。

壹號位（B）墳地長廿四英尺，闊十六英尺，定價壹百元，每加葬一穴，另收費五十元，但不得超過二穴。

貳號位（C）墳地長廿英尺，闊十二英尺，定價五十元。

參號位（D）墳地長十四英尺，闊八英尺，定價十五元。

四號位（E）墳地長十二英尺，闊七英尺，定價五元。

孩童位（F）墳地（年齡在七歲以下者）每位定價貳元。

凡購買超等位（AA）或特別位（A）者，準予在劃定範圍內任由選擇及預買。壹號位（B）至四號位（E）墳地，必須按照本塚山編排之穴位號數順序安葬，不得預買或選擇。

第十一條：本塚山穴位體積規定如下：超等位（AA）特別位（A）壹號位（B），長八英尺，闊四英尺，深六英尺。貳號位（C）參號位（D）長八英尺，闊三英尺六寸，深五英尺。四號位（E）長八英尺，闊三英尺，深五英尺。以上所規定體積，由本會館負責僱工開鑿，如欲加大者，其工資每英尺一十元，該款由喪家自理。（巴生福建會館志略文獻編輯委員會，《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177-178。）

如前所述，本文以5年為一區段，自1921年起至1955年，取8個區段各區段前200筆資料，共1,600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下，即針對祖籍地、壽命、死亡原因、行業、性別與婚姻狀況等5項說明。

(一) 祖籍地來源

一般公認，巴生以福建移民居多，但福建移民的祖籍地來源或其比例並沒有確切的統計。從福建義山墓冊的統計中可發現，巴生福建幫組成不是狹義方言群分類，而是一個原鄉行政區域（福建省）的概念，涵蓋閩南各縣、閩中的仙遊與莆田，鄰近潮汕的詔安也算在內，儘管比例上以閩南語系居多。

進一步分析，在1920至1955年代，下葬於福建義山者以永春人居多，在1935年代以前，比例達35.5% - 37.5%之間，只在1940年代、1950年代兩個區段佔26.5%、26.0%，在1945年代甚至高達39.5%。當然，永春人比例較高的現象，與福建義山（福建公塚）1948年以前由閩南公所與永春公所輪流經辦，永春人較為集中葬在此處有關。不過，除非返回中國原鄉或極少數私人墓地外，當時多數巴生福建人沒有其他義山可葬，因此，這個比例大致也可反映福建社群的社群比例。（見附圖13、14）

佔比第二多的為南安人，在1945年代以前，除1930年代佔9.5%之外，多落在10.0% - 19.5%之間，1950、55年代則降至7.5%、8.5%。第三位為金門人，在1920年代時僅為8.5%，仍落後於同安人的10.0%之後，但在1925年代以後，幾乎穩定地居於第三（除1940年代少於安溪人的10.0%外）。排名第四至第九者，分別為同安、安溪、仙遊、詔安、惠安、廈門、莆田。其中，仙遊移民在1920年代、1925年代比例仍非常小，僅有1.5%、0.5%，但1930年代以後提升到4.0% - 6.5%之間，則成為一定比例的移民社群；相反地，莆田一開始在1920年代有5.5%（佔當年份的第五位），之後掉到3%以下。巴生地區閩中移民的祖籍地由莆田轉成仙遊，趨勢非常明顯。這些統計可得知巴生地區華人不同地緣移民之消長。

(二)壽命方面

資料顯示，1935年代以前葬於福建義山者，最多者為1至10歲的孩童，高達4成以上。這些葬於義山「孩字界」²⁷的未成年者，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說明當時孩童照顧、醫療、營養等條件不足。另一個現象是：在1950年代以前，除11至20歲的亡者略少一些外，亡者的年齡層分布相當平均，21-50歲的人數與比例並無太顯著的差距，各年齡層約有10%左右。青壯人口過世者多，大體也可說明勞動條件不佳、海外水土不服、醫療條件不良等現象。在1945年代以前71歲以上的長者比例不到5.5%，1935年以前甚至低至2%，長壽者不多。明顯地，20世紀中葉巴生福建移民的平均壽命並不長。

進一步分析，在1935年代以前，孩童死亡人數多，比例在42.5%至48.0%之間。這可說明，福建義山一開始處理未成年亡者即為主要工作，因此也需要單獨闢建名為「孩字界」的專屬墓區。一直要到1940年代，孩童的死亡人數才降下來，不過仍為所有年齡層最高者。

再以死亡孩童年紀分析可知，1歲的死亡比例最高，隨着年紀增加而遞減。墓冊資料中也看到對於孩字界定義的調整，從1920年代為10歲（不含）以下到1930年代以後採計7歲（不含）以下。1940年代以後，孩童比例從4成多降至28.5%（1940年）、18.0%（1945年）、11.5%（1950年），除1955年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比例又攀升至34.5%外，大概可說明孩童的存活率在1940年代以後大幅提升；同時在幼童死亡年齡統計分析中可知，3歲（含0-1、1、2、3歲）的死亡率遠高於4（含）歲以後，4歲以後的存活率高了許多，顯示當時3歲以下的嬰幼兒不易養育的現實情況。

不僅如此，在1955年代青壯年過世的情況，在數量與統計比例上比起之前的時段大幅降低，分別是2.0%（11-20歲）、4.0%（21-30歲）、6.5%（31-40歲）、5.5%（41-50歲），平均壽命比1940年代以前有顯著提升。（亡者的資料統計見附圖15、16、17）

²⁷ 在巴生福建義山，早夭的孩子不與成人葬在同一區，另闢孩字界專門安葬。有關孩字界的界定各年份不一，年齡方面，孩童墓1920年、1935年不含10歲和其他不含7歲（會館的公塚細則是寫7歲以下，不含7歲）。1920年代是10歲不葬在孩童墓，1925年代因為沒有7至10歲的數據，因此並不清楚。1930年代則是7歲就不葬在孩童墓。1935年代的7至9歲又葬回孩字界。1940年之後7歲不葬在孩童墓。

(三) 死亡原因

墓冊中詳細記載了亡者的死因，記載着久病、熱症（寒熱症）、驚風、老病、生產、咳症、肺病、急症、痢疾、溺水等各種死因。²⁸ 雖然沒有現代醫學使用的疾病學的名稱，但也有助於我們推估巴生地區不同時期的公共衛生與健康醫療情況。

從統計中，在1945年代以前，熱症（Dengue fever，因登革熱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由蚊子傳播給人類，會引起發燒、頭痛、肌肉及關節痛等症狀）是最主要的死因，比例上在19.0%至33.0%之間；顯然，這是當時熱帶地區最主要的疾病，巴生也不例外。久病，佔第二位，從10.5%至30.0%之間。第三位為驚風²⁹，在10.5%至25%之間，這是好發於1至5歲嬰幼兒的急症。第四位是生產，有3個時間區段均達7%，到了1950年代才降至1.5%。這說明當時婦女生產有相當的風險，照顧也不足。

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如咳症、肺病、喉症等，在1945年代以前，加總起來仍佔一定的比例。1950年代之後，則明顯減少許多；另一方面，自然老化的死因在1945年代以後比例提高，代表巴生的公共衛生在1950年代之後有顯著的改善，其他疾病致死減少，平均壽命增長，故資料統計上顯示自然老化的比例增加。（見附圖18、19）墓冊資料中的死亡原因，透露了1920年代至1950年代間巴生的疾病、公共衛生與醫療力量的部分線索。

(四) 行業方面

墓冊記載了亡者的行業，扣除未成年及未有紀錄者，在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巴生福建人，其行業類別有工人（工業）、商業、種植、園業、捕魚、車業、行船、失業、書記、其他等。其中，在1950年代以前數量最高者

²⁸ 有關死亡原因的類型，包括久病、熱症（寒熱症）、驚風、老病、生產、咳嘆、急症、意外事故、溺水等，為墓冊上所記載之用語。墓冊上並無嚴格定義，這些用語也多半是華人民間社會對於死亡類型的一些概念，不一定有嚴格的現代醫學界定。如久病與老病之差別，可能前者是年紀較輕但已生病一段時間，後者應是專指老邁之人。又如急症，可能就是心臟病發、猝死等狀況。咳症、肺病、喉症均與呼吸道或肺部有關。墓冊上並無使用如天花、霍亂等病名。

²⁹ 驚風(*infantile convulsion*)，以急性發作性頻繁的四肢抽搐、眼球上翻、斜視、牙關緊閉、痰壅氣促，伴有暫時意識不清為臨床特徵的兒科急症。多由高熱或驚嚇所引起。又稱急驚風。相當於西醫的驚厥。可見於任何季節，多見1至5歲的嬰幼兒，年齡越小，發病率越高。（2022年4月19日，<http://cht.a-hospital.com/w/驚風。>）

為工人，比例自1920年代至1950年代分別佔40.00%、49.37%、84.42%、36.62%、58.02%，是巴生福建人最主要的行業。³⁰ 其次是從事商業的人口，除1930年代、1935年代低至2.60%、7.04%外，各年份均在10.00%至20.00%不等。接續才是種植、園業、捕魚、車業、行船等，這也反映着巴生周邊的農業概況，以及說明了巴生港口相關行業的概況，包括漁業、行船等。這些行業的統計呈現了戰前巴生福建社群職業分布的樣貌。（見附圖20、21）

（五）性別與婚姻狀況

眾所周知，東南亞華人移民初期階段以男性為主，性別比例不均是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墓冊資料中，在1945年以前，巴生福建社群的男性比例一般在62.0%至65.0%之間，性別比例可謂相當懸殊。1950年代以後男性比例略有下降，在56.5%、53.5%之間，才逐漸趨近平衡。（見附圖22）

在婚姻方面，扣除未成年亡者及不詳者，已婚者的比例高於未婚者，到了1950年代已婚者比例佔75.0%、未婚者18.5%。但是沒有完整資料顯示這些人的配偶在巴生或在中國原鄉³¹。亦即，1920年代起，南來巴生的福建人多數在故鄉或新地擁有配偶。但若進一步比對1950年代的性別比例，女性升到41.0%，比起之前30年都高，因此大致可推論，最遲到1950年代，巴生福建社群的性別結構較為平衡，且已逐漸落地生根。（見附圖23）

由上述的統計分析得知，巴生福建義山墓冊的訊息量非常豐富。1,600筆資料的統計與分析，一方面幫助我們勾勒1920年代至1955年代間巴生福建社群的社會史，一方面也提供義山相關文獻如何應用於華人社會研究之一種新路徑。

五、義山：一種華人社群政治的場域

孔復禮(Philip Kuhn)在《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一書以「親緣群體與文化範本」來解釋海外華人的社團，他提到這不是複製中國原鄉的模式，而是適應海外生存而調整的變遷：

³⁰ 到了1955年，可能是因為墓冊資料不完整，僅有15筆，故統計比例驟降至6.67%。

³¹ 婚姻部分，記錄中提到，有些亡者的妻子在中國。1920年代標示妻子「在唐」（在唐山）的有7筆，1925年代有10筆。之後的年代就沒有再看到了，也就是不再紀錄是否「在唐」。

華人社團的組織型態主要可分為四大類（當然這四類組織形態時常有相互結合或重疊的狀況）：華人親緣是華人文化範本的主色調，主要包括地緣紐帶（compatriotism，同省、同縣、同鎮乃至於同村，以方言區分）、血緣紐帶（kindship，也可能是想像的）、神緣紐帶（corituality，信奉某共同神靈）、以及兄弟會（brotherhood，類似「私會黨」）。這些組織形式都源自中國本土，其歷時久遠且已經深深地紮根於中國社會，但是它們被加以靈活地應用，不只是僵化地複製中國社會的古老模式（實際上也不可能），而是最為具有靈活性的範本，適應了海外華人在當地千變萬化的社會環境中謀求生存發展的需要。^㉚

對此，廈門大學曾玲以新加坡華人移民幫群組織為例，討論廟宇、墳山的社群化過程。她也提到研究範式的轉移：

「中國視角」是華人社團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顯然，這樣的研究導向忽略了從東南亞在地的歷史脈絡與華人移民社會內部來考察華人社會建構與演化的歷史過程。……隨着陳育崧關於華人移民社會「幫」結構理論的提出，研究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史的一些學者開始跳脫原有的「社團」的思路，轉而以「幫」與「幫群組織」理論來考察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結構及其特徵。^㉛

在反省中國視角或原鄉移植這種單向文化傳播觀點之際，我們回到義山的討論。在過去的研究，義山文獻資料之運用多數以墓碑為主，如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的黃文斌在馬六甲三寶山的研究中，抄錄了晚明至清嘉慶年間之墓碑，討論與分析墓碑上的祖籍地書寫的課題。^㉜ 幫群會館研究上，主要的材料也是碑文資料，缺乏會議紀錄、賬本、章程等華人社會內部檔案記錄。是

^㉚ 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214-215。

^㉛ 曾玲，《新加坡華人宗鄉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162-164。

^㉜ 黃文斌，《馬六甲三寶山墓碑集錄（1614-1820）》（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13）。

故，曾玲進一步指出「碑文所具有的片段及靜態的史料特徵，使得他們的研究很難涉及動態的社會脈絡對華人幫群結構演化制約作用等問題的討論，更無法從華人移民社會內部具體考察『幫』結構的形成與『幫群組織』的建構與運作等問題。」³⁵因此，她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收集到新加坡廣客兩幫的綠野亭和其所屬的「廣惠肇」「嘉應五屬」「豐永大」的會館、廟宇、墳山、學校等保留下來的碑銘、賬本、董事部會議記錄、章程、紀念特刊等各類文獻，進而指出在1824-1927年廣客兩幫以「神」（指的是海唇福德祠、望海大伯公等廟宇所祭拜的大伯公神明）、「鬼」（指的是埋葬在青山亭、綠野亭、碧山亭等廣、客設立的幫群墳山中的「先人」）的「社群化」，提供了移民社群整合的文化資源、認同紐帶。綠野亭是歷經一個世紀的運作之後建立的組織機構與規範化的管理系統，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³⁶

是故，在本文的研究中，我們可發現巴生福建會館及義山歷經一種擴大社群邊界的社會過程。從一開始的以永春人為主的公塚到後來成為福建社群的公共義山，打破了地緣的藩籬；接着，進一步接納非福建（閩南）方言群的社群，閩中的莆田、仙遊移民以及鄰近潮汕、社群結構為閩客混居的詔安移民均可安葬於內。由於巴生地區的義山僅有福建義山與廣東義山兩部份，這種社群分類意識不再是方言群的概念，而是來自原鄉行政區域的劃分，更照顧了少數方言群體移民的權益做法，打破了方言群的分類意識。超越地緣、方言群的邊界是巴生華人社會整合模式的特點之一。

而義山墓冊所留下的記錄，恰恰為後人提供了巴生福建社群的眾多社會訊息，包括前述分析的祖籍地、壽命、死亡原因、行業、性別與婚姻狀況等，讓1920年代至50年代的一個具體海外華人社區（社會）得以鮮活地被描述出來；義山的安置，也可幫助我們瞭解20世紀初期迄今福建會館的具體運作。

此外，義山，不僅是一種華人社會整合的機制，也是一種具有物質向度的、象徵性的文化景觀(symbolic cultural landscape)。一般來說，文化景觀是人群與環境在特定歷史演進下的產物，是政治、經濟、文化、土地利用方式

³⁵ 曾玲，《新加坡華人宗鄉文化研究》，頁164-165。

³⁶ 曾玲，《新加坡華人宗鄉文化研究》，頁186-191。

等的具體表現。^{③7}因此我們可以說，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義山是「歷史性的設計景觀」(historic designed landscape)類型，也是華人社會的「歷史場域」(historic site)、「歷史風土景觀」(historic vernacular landscape)，更是一種「民族誌的景觀」(ethnographic landscape)。^{③8}義山是巴生華人社會文化的一種物質再現。反過來說，義山的出現與運作也促使了社群的再結構，同時這種文化景觀具有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也是社群的精神性空間，也是海外華人社會運作的物質基礎之一。義山是海外華人社會落地生根機制的關鍵，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精神家園與文化景觀。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社會研究中，人類學對於宗族、家族的討論相當多。學者一般認為，發軔於北宋，盛行於明清的新式宗族是由許多核心家庭、主幹家庭或共祖家庭組成的，共財單位很少超出祖父的成員，但通聲氣、濟有無的範圍卻可以遠過於五服。它的基礎至少有四：族譜、義田、祠堂和族長。^{③9}鄭振滿認為宋代以後，宗法倫理的庶民化、基層社會的自治化、財產關係的共有化，代表了家族組織的發展。^{④0}孔邁隆(M. Cohen)將中國人的家族構分成三個要素：家產、成員與家計。所謂的家產指的是分家過程中可以運用的土地財產，家族成員是指對家產有特定權利的人，家計是

- ^{③7} 「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Santa Fe)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時所提出，同年納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執行指導方針》(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中。其中，在這裡定義「『文化景觀』一詞包括了人類與其所在自然環境之間互動的多種表現」，並說明「文化景觀屬於文化遺產，正如《公約》第一條所述，它們是『人類與大自然的共同傑作』，文化景觀見證了人類社會和居住地在自然限制和/或自然環境的影響下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產生的進化，也展示了社會、經濟和文化外部和內部的發展力量」。而「其所處自然環境的局限性和特點，文化景觀通常能夠反應可持續性土地利用的特殊技術，反映了以及與大自然特定的精神聯繫。保護文化景觀有利於將可持續性土地使用技術現代化保持或提升景觀的自然價值。傳統土地使用形式的持續存在支持了世界大多數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因此，對傳統文化景觀的保護也有益於保持生物多樣性」。(“Cultural Landscape”，2021年4月24日，<https://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
- ^{③8} “Understand Cultural Landscapes”，2021年4月24日，<https://www.nps.gov/subjects/culturallandscapes/understand-cl.htm>。
- ^{③9}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849-851。
- ^{④0} 參見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透過一種共同預算之安排而對家產及其他收入之利用。^⑪ 李亦園在陳奇祿主編的《中國的臺灣》（1980）發表的〈臺灣傳統社會制度的源流〉一文中，也認為一個家族的存在包含三種成分，其一是組成成員，其二是家族的經濟，其三是家族的財產，包括房屋田地等。^⑫ 因此，不論是宗族還是家族的建構，物質性的義田、祠堂、家產或族產是其構成的關鍵元素之一。

那麼，當東南亞的海外華人社會單元不再是如同原鄉的宗族或家族時，作為一種新建構的方言社群社會，義山文化景觀之於移民社會的重要性就如同宗族社會的祠堂等空間，它既是移民社會的產物，也是移民社會的作用者；它既是精神象徵，也有物質意涵。義山文化景觀的規劃設計、經營管理，是社群政治（community politics）運作的場域，也是移民社會的文化特徵。華人會館與義山作為一種機構（機制），其所呈現的兩種課題：整合生者的社群政治及處理亡者的文化景觀，前者關乎世俗事務，後者涉及宗教民俗。

在巴生福建社群的案例中，義山（福建公塚）一開始並非福建會館的附屬單位，而是永春公所、閩南公所輪流經辦，1948年才整合由福建會館統辦之。「增購塚地，並充實塚地設備改善設施及訂立公塚細則」等工作成為會館的重要事務。而自1921年開始所留下來的大量墓冊資料，是義山研究重要的文獻資料，更為我們提供瞭解巴生福建社群社會史的新視野。

（責任編輯：程錦荷；實習編輯：康婕）

^⑪ Myron L. Cohen,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the Chinese Domestic Group,” in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ed. M.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28.

^⑫ 李亦園，〈臺灣傳統社會制度的源流〉，載陳奇祿主編，《中國的臺灣》（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頁326。

附圖1：巴生福建義山墓冊總冊

資料來源：福建會館藏，1921年。

附圖2、3：公塚登記簿、收據簿

資料來源：福建會館藏。左圖為登記簿（1941年），右圖為收據簿（1950年）。

附圖4：墓冊總冊中的登錄信息

記錄部號	報告日	死人名	某縣人	或男或女	事業	已結婚或未結婚	死期年月日	何病死	死處	子之名	子之名	夫妻之名	通報人名	地址號	交銀幾元	特別記事

附圖5：巴生谷城市群



資料來源：谷歌地圖。

附圖6：巴生河景觀



資料來源：2018年8月16日拍攝。

附圖7：巴生觀音亭



資料來源：2018年8月16日拍攝。

附圖8：巴生福建會館大廈落成



資料來源：1977年。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53。

附圖9：福建社團聯合會會長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主持開幕剪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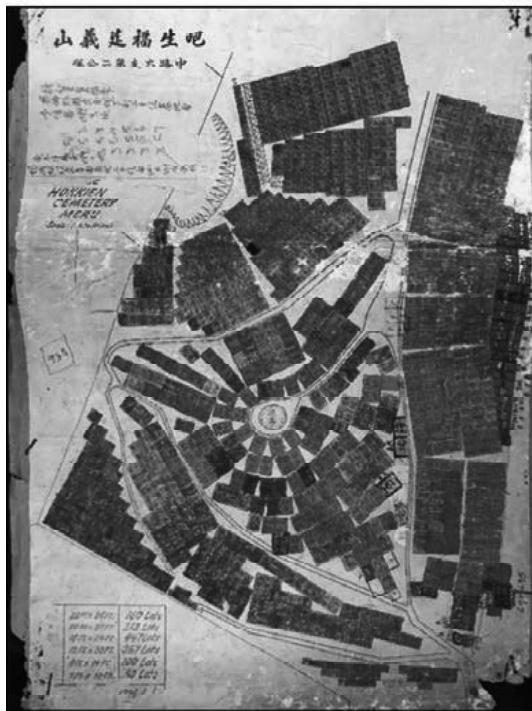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1977年。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巴生福建會館誌略、文獻》，頁52。

附圖10：巴生福建義山中路口義山



資料來源：2019年拍攝。

附圖11：巴生福建義山中路六支第二公塚1976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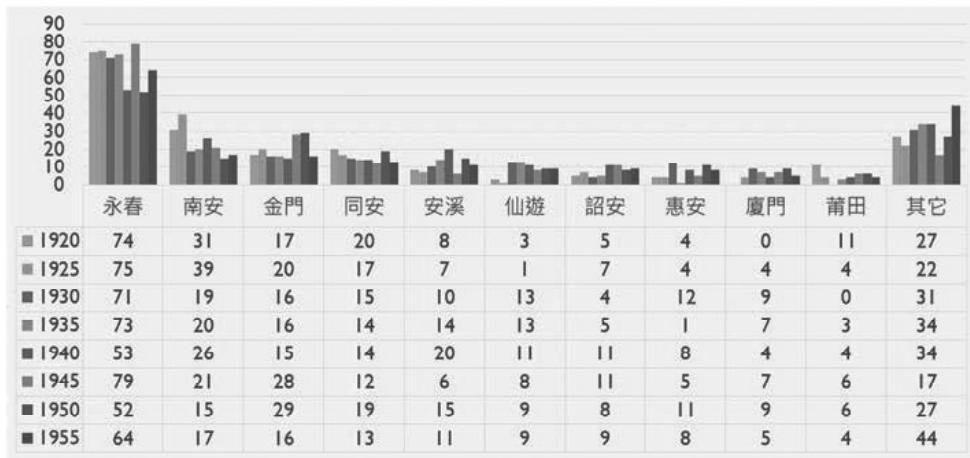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巴生福建會館藏

附圖12：頌德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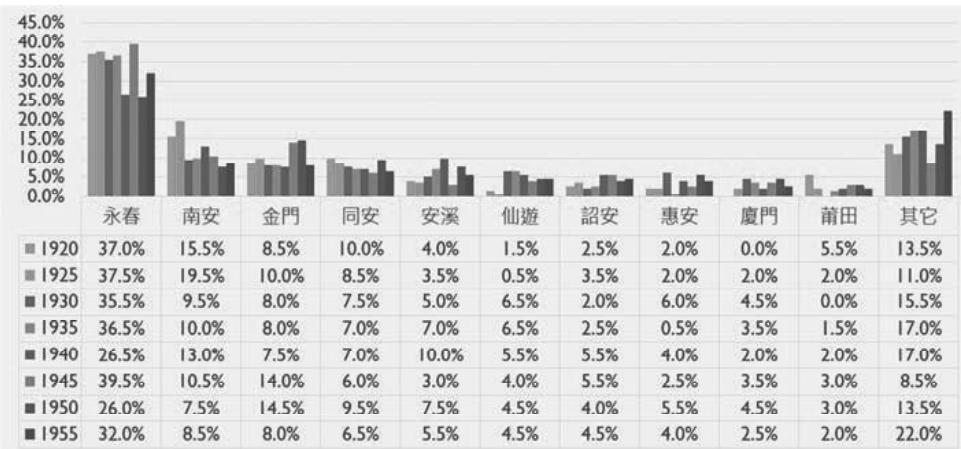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2020年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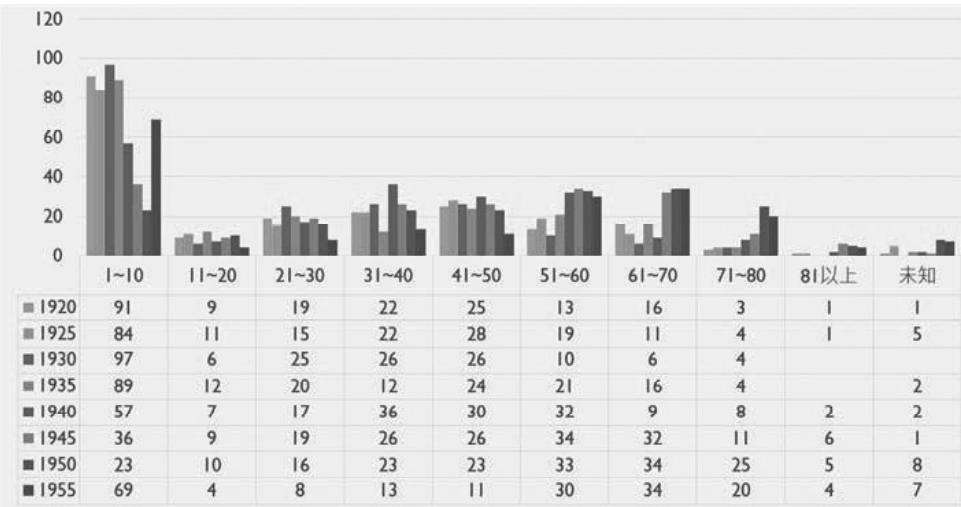
附圖13：巴生福建移民祖籍地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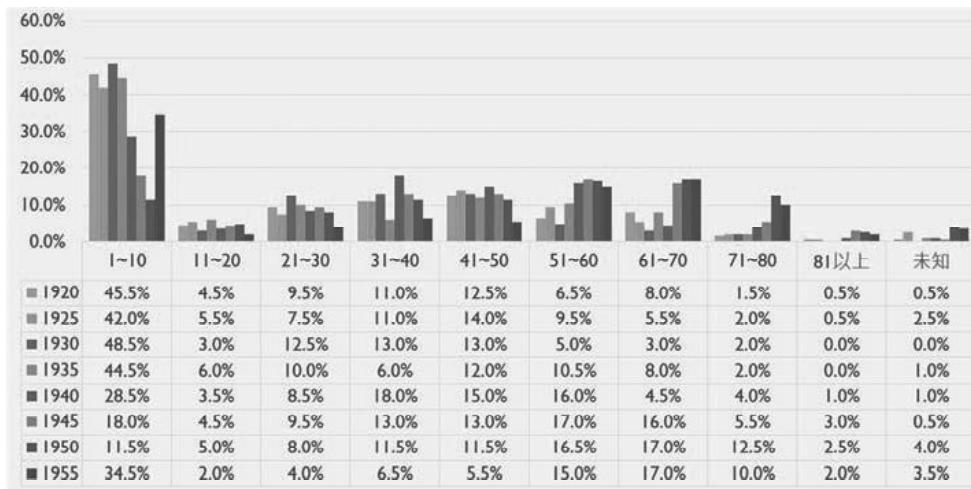
附圖14：巴生福建移民祖籍地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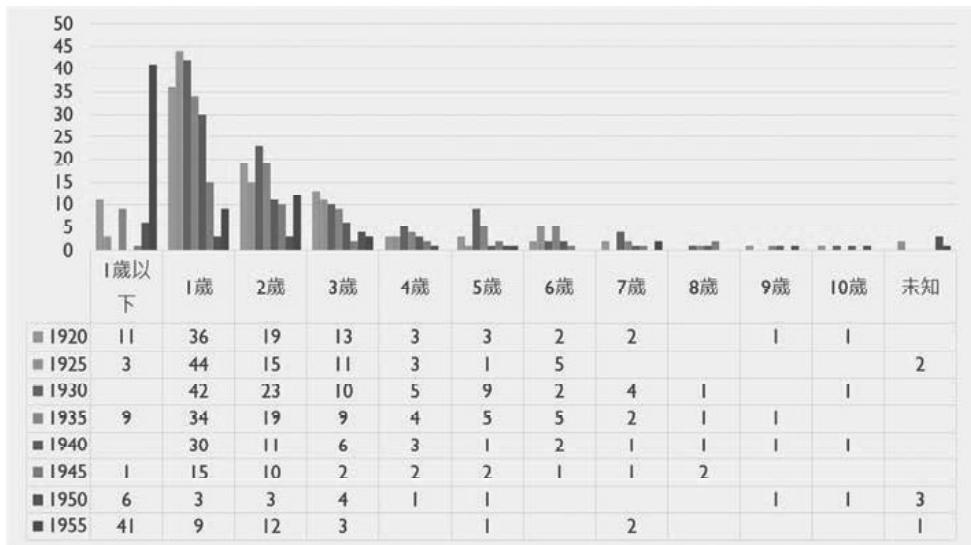
附圖15：福建義山亡者的年齡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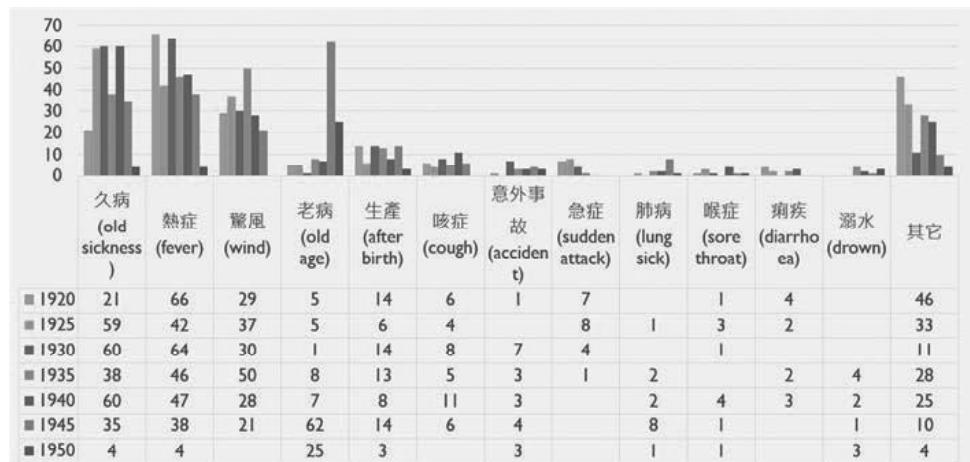
附圖16：福建義山亡者的年齡比例



附圖17：孩童死亡年齡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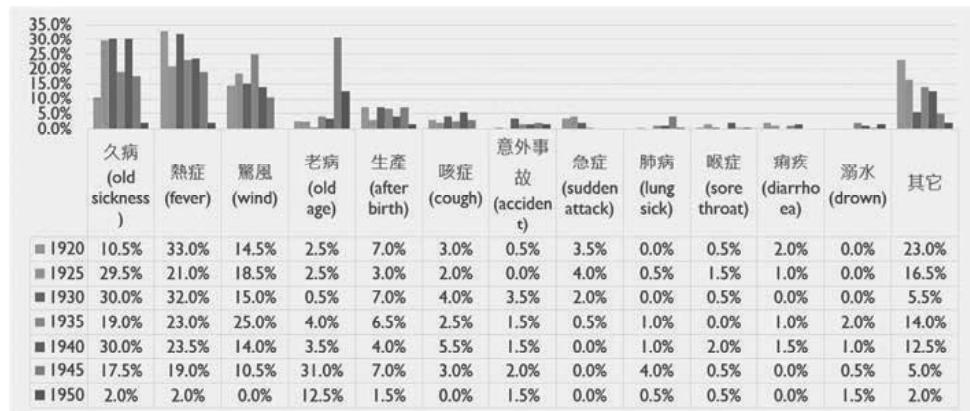


附圖18：死亡原因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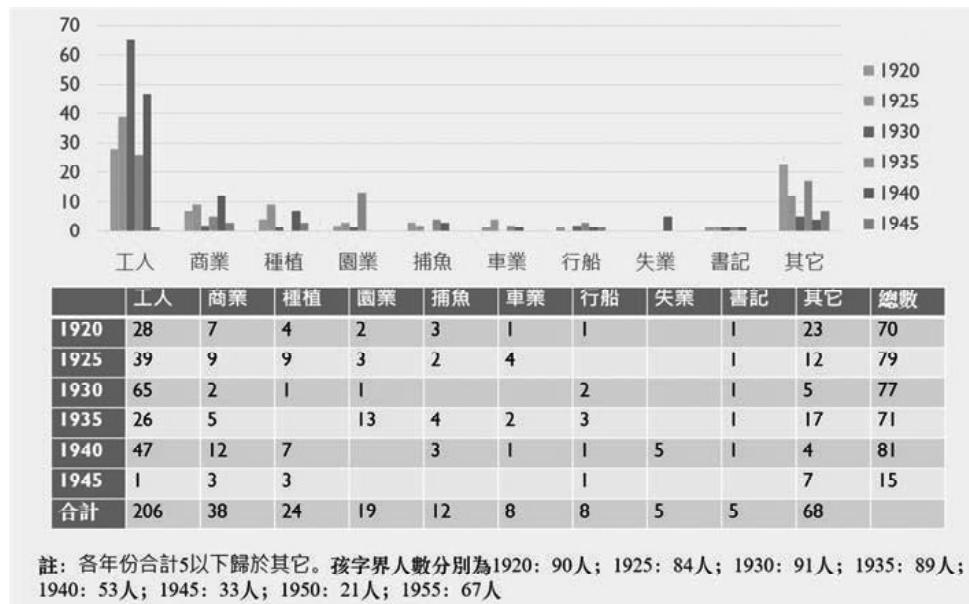


註：各年份合計10以下歸於其它，1950有152筆資料未填寫，1955年200資料均未填寫，故不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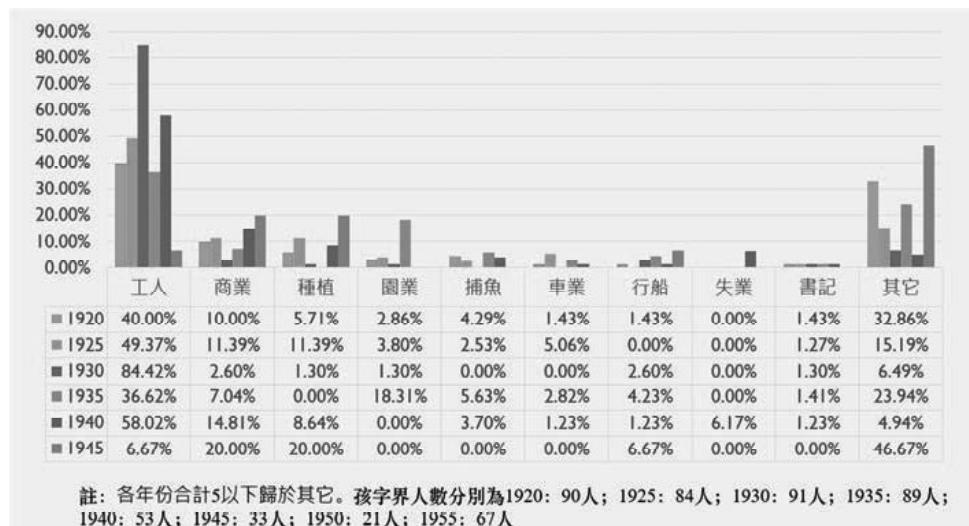
附圖19：死亡原因比例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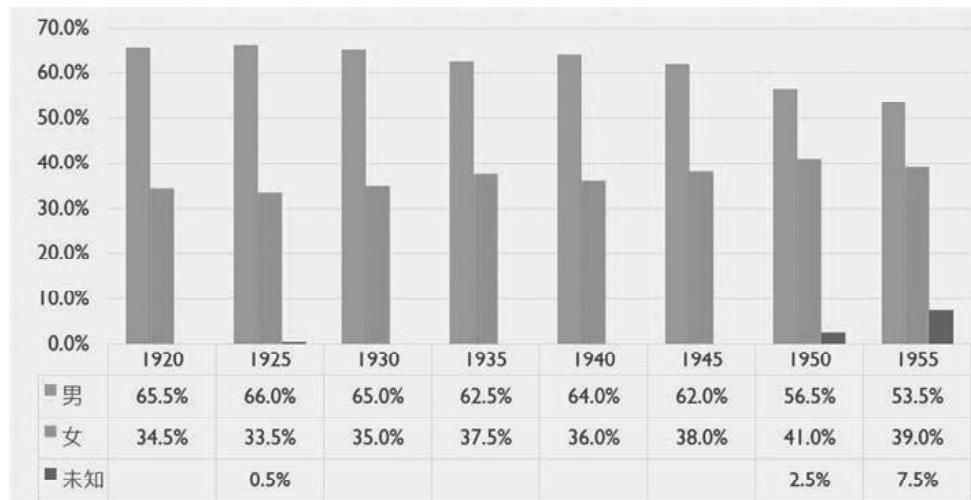
附圖20：行業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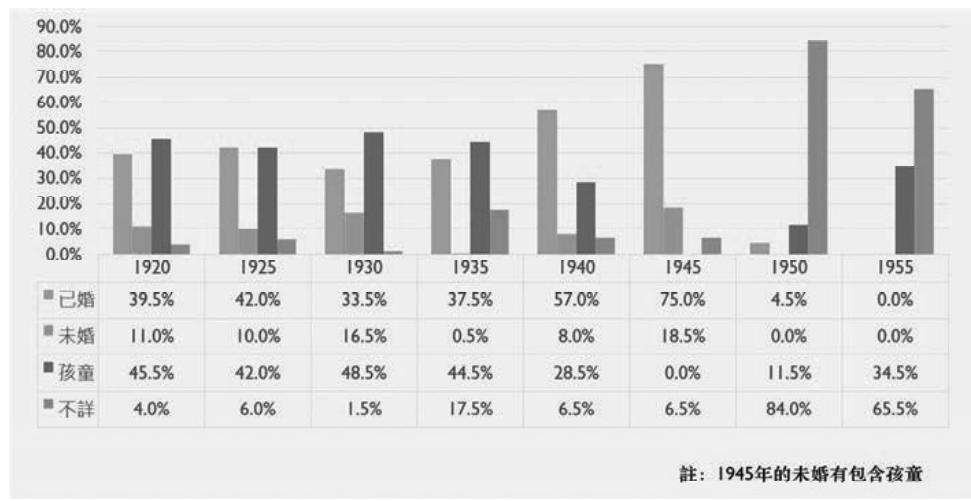
附圖21：行業統計比例



附圖22：性別比例



附圖23：婚姻狀況統計



附表1：抽樣的年份與時段

年份	時段	抽樣數
1920	1921年11月26日至1924年11月18日	200
1925	1925年1月2日至1925年4月8日	200
1930	1930年1月1日至1930年8月14日	200
1935	1935年1月4日至1935年11月13日	200
1940	1940年3月22日至1940年12月30日	200
1945	1945年9月21日至1948年11月14日	200
1950	1950年1月13日至1952年6月8日、1950年10月8日至1950年12月10日	200
1955	1955年1月3日至1955年7月17日	200
小計		1,600

附表2：巴生族群比例變遷

族群	人口					
	1957		1970 ^③		2010 ^④	
馬來族	37,003	24.68%	72,734	31.13%	234,293	41.18%
其他土著					9,107	1.60%
小計					243,400	42.78%
華族	65,454	43.65%	100,524	43.02%	152,582	26.83%
印度族	44,393	29.60%	59,333	25.39%	121,533	21.37%
其他	3,105	2.07%	1,079	0.46%	2,994	0.53%
馬來西亞公民小計					520,509	91.53%
非公民					48,198	8.47%
總計	149,955	100.00%	233,670	100.00%	568,707	100.00%

資料來源：“Klang (city)”，2020年12月22日，https://wikivisually.com/wiki/Klang_%28city%29#cite_note-demo-30。

^③ 1957、1970兩次人口統計資料，詳見 Katiman Rostam, “Population Change of the Klang-Langat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Malaysia, 1957 – 2000,” *Akademika* 79: 1 (2010): 1-18.

^④ 2019年12月22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7082213/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population/04Jadual_PBT_negeri/PBT_Selangor.pdf。

附表3：雪蘭莪州各城市人口統計表（2016年）

排名	城市	人口(人)
1	巴生市(Klang)	1,089,099
2	安邦(Ampang)	788,145
3	梳邦再也(Subang Jaya)	767,899
4	莎亞南(Shah Alam)	680,211
5	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	644,291
6	蕉賴(Cheras)	633,002
7	加影(Kajang)	480,277
8	士拉央(Selayang)	265,297
9	萬撓(Rawang)	158,904
10	青翠木花園(Taman Greenwood, 或指鵝嘜 Daerah Gombak)	162,084

資料來源：雪蘭莪州官方網站，2020年12月21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928090330/http://www.selangor.gov.my/main.php?Content=vertsections&SubVertSectionID=52&VertSectionID=3&CurLocation=3&ID=&Page=1>。

Social History Information in the Record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Cemetery: A Case Study of Hokkien Cemetery for Chinese in Klang Selangor, British Malaya, 1920s-1950s

Bo-wei CHIA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Klang was a royal town and former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Malaysia. It is located in west-central Peninsula Malaysia, about 35 kilometers east of Kuala Lumpur and is the port city of the Klang Valley. From the 19th century, tin industry developed rapidly and Klang's importance increased. The early settlers began to mine tin along the river valley starting from the port area and gradually extended into the outlying areas surrounding Kuala Lumpur.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bber industr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of Klang in 1901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South China immigrants and Indian Tamil-based immigrants who moved to Klang to engage in manual labor, barge shipping or related busi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Klang occurred much earlier than Kuala Lumpur, and the settlers were mainly Hokkien (Southern Fujian) immigrants. In Klang, the Hokkien Guild (gongsuo) was established in 1904.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forge closer relationships among members and seek welfare benefits for them. In 1901, Ang Yee Chew donated a

Bo-wei CHIA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 162, Sec. 1, Heping E. R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E-mail: quemoei@gmail.com.

part of the Zhonglukou rubber plantation to set up the Hokkien Cemetery. The cemetery was initially managed by the Eng Choon Kongsi (predecessor of the Eng Choon Association), and later became a public cemetery for Hokkien people. Since 1921,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Hokkien Cemetery have remained largely intact and are now preserved by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These documents recor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names of the deceased, their ancestral hometown, age, cause of death, residence, marital status, family members. They are precious social history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Kla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cemeteries as a venue for dealing with funeral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was part of a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n immigrant social community, an autonomous mechanism of community politics, and a cultural landscap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Klang, Selangor, British Malaya, and explor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emetery as a public domain within communit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First, it analyzes how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was an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urthermore, on the basis of fieldwork and archival research in the cemetery, it analyzes the changes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Klang.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its public cemetery as an institution that dealt both with the community politics of the living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dead.

Keywords: Chinese Association, Public Cemetery, Community Politics, Cultural Landscape, Hokkien Community, British Malaya